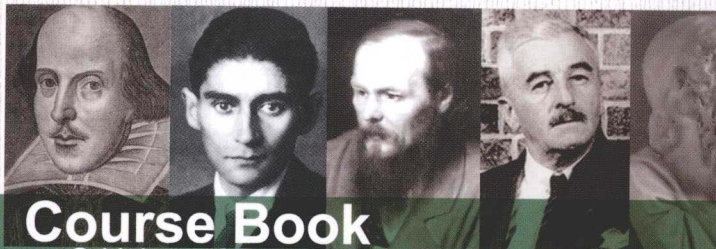


211 工程项目

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



Course Book
on Criticism of Foreign Literary Masterpieces

章安祺 主审

外国文学名著 批评教程

梁 坤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569
48

中国人民大学 211 工程项目
章安祺 主审

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

梁 坤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梁坤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6282-8

I. 外… II. 梁… III. 文学批评史—世界—高等学校—教材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3476 号

书 名: 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

著作责任者: 梁 坤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282-8/I · 217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75 印张 435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编写工作已逾五年。逾五年而不弃,是因为选题的价值使得我们不忍割舍;而定稿一再推延,则由于选题的难度为我们所始料不及。

“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历来是我国大学中文系学生必修的专业主干课。长期以来,那种纠缠于抽象概念演绎推导的理论课使人觉得枯燥无味,没有活气;而热衷于时代背景、故事情节的文学课又让人感到平淡如水,没有深度。史论课程教学如何才能既增强学生的审美感悟又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一直是相关教师必须面对的课题。记得1984年,季羡林先生在“外国文学学会”的年会上致闭幕词时曾强调说:要想提高外国文学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必须向“理论”开拓,要认真研究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东方文论。我想,如果“文艺理论学会”讨论提高文艺理论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问题,结论也许就是:必须与“实践”结合,要密切关注创作实践、鉴赏实践和批评实践。只有这样,“史”的课程才能发人深思,使人有“道”的领悟;“论”的课程才能鲜活灵动,让人有“美”的感受。

编写《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就是试图促进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关注并汲取外国文学批评史和理论史的研究成果。这不仅可以校正由时代、地域或文化心理等因素造成的读解误差,从而更准确地把握经典名著的审美底蕴,而且能够展现理论观念的演变历程和批评方法的运作规律,以便进一步深化教学的理论内涵,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编写宗旨明确之后,随之而来的关键就是要遴选名著篇目和聘请相关专家。首先,遴选名著。这或许会涉及学界争议中的“经典”问题。我们原则上按两条标准:一是“长时间”“多数人”的传统评价;二是批评理论史上有较大反响。其次,聘请专家。这直接关系到本书宗旨能否实现和学术品位高低。我们实际上有两条要求:一是具有“史论兼备”的学术素养;二是长期从事相关作品的研究。值得庆幸的是,确有不少著述颇丰的资深学者应邀加盟;而且,面对这万字左右的文章,他们依然是那样认真严谨、精益求精,让人肃然起敬。此外,为了方便读者深入研究查询,

本书还附设了“关键词”、“推荐阅读书目”、“参考文献”、“相关网址”和“作品推荐译本”等栏目。

目前,编写外国文学名著的批评史国内未见先例,尚无经验可循,不当乃至错误之处必多,还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正。

章安祺

2008年冬于大连文萃轩

本书编写者名单

- 第一章:陈中梅(社科院外文所 研究员)
第二章:耿幼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教授)
第三章:朱振宇(美国波士顿大学 博士)
第四章:陈凯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张伟劼(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讲师)
 张天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硕士)
第五章: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教授)
第六章:刁克利(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第七章:吴岳添(社科院外文所 研究员)
第八章:莫光华(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 副教授)
 杨武能(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教授)
第九章:章安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教授)
第十章:郭宏安(社科院外文所 研究员)
第十一章:冯寿农(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教授)
第十二章:张玲(社科院外文所 编审)
第十三章:王志耕(南开大学文学院 教授)
第十四章:吴泽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第十五章: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教授)
第十六章:谢莹莹(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教授)
第十七章:刘象愚(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教授)
第十八章:梁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教授)
第十九章:杨彩霞(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第二十章:陈众议(社科院外文所 研究员)

目 录

第一章	荷马史诗：跨越时空的经典	(1)
第二章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永远的神话	(17)
第三章	但丁的《神曲》：“喜剧”的沉浮	(29)
第四章	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闪耀着理想光芒的疯癫骑士	(45)
第五章	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诠释和想象的空间	(58)
第六章	弥尔顿的《失乐园》：经典的确立与阐释的歧义	(72)
第七章	卢梭的《忏悔录》：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83)
第八章	歌德的《浮士德》：德意志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试金石	(93)
第九章	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灵视与悲曲	(111)
第十章	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一个时代的梦想与遗憾	(125)
第十一章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对艺术的艰辛追求	(134)
第十二章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螺旋式的猜谜与破解	(152)
第十三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批评的复调	(167)
第十四章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精神世界的艺术探索	(181)
第十五章	T. S. 艾略特的《荒原》：“雷声究竟说了些什么”	(196)
第十六章	卡夫卡的《审判》：存在与现实	(210)
第十七章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从“天书”到乔伊斯产业	(228)
第十八章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对秩序和意义的希冀	(245)
第十九章	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文本与阐释的多重空间	(259)
第二十章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美洲的魔幻与真实	(277)
附录	关键词	(288)

第一章 荷马史诗：跨越时空的经典

荷马(Homeros)相传为古代希腊两部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9—前8世纪之间,生平无从查考。他是小亚细亚一带的盲诗人,是具有高度艺术才能的民歌艺人,也是把这两部史诗初步定型的伟大诗人。

公元前12世纪末,希腊半岛上的阿开奥斯人联合进攻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特洛伊城,鏖战十年,特洛伊城为希腊人毁灭。战争结束后,在小亚细亚一带便流传着许多关于英雄故事和神话传说的短歌。民间歌人将这些短歌口头传授,代代相传。在长期口传的过程中,许多行吟诗人对它们进行过加工改造。荷马即以此为基础,加工整理形成了具有完整情节和统一风格的两部史诗,但那时还只是一种演唱本,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雅典执政官裴西斯忒拉托斯(即庇士特拉绥)组织编订,荷马史诗才有了文字记录。公元前3—前2世纪亚历山大城几位学者校订之后,史诗有了最后定本。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各为24卷的两部史诗。

《伊利亚特》描写的是特洛伊战争的经过,歌颂英雄们的骁勇和业绩;《奥德赛》叙述了特洛伊战争结束后,英雄奥德修斯历经艰险,返乡后杀灭求婚人并与妻子团聚的故事,赞美了英雄的坚毅和智慧,表现人与自然的斗争。两部史诗内容上相互补充,风格上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幅远古时代希腊社会生活的完整画卷,表现了氏族社会时期古希腊民族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描述人类社会童年的百科全书。

西方人功底深厚和流派众多的作家及作品评论,实际上是从一个至今仍然有所争议和不甚牢固的基点上开始的。这听起来或许显得玄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却是我们不得不勇敢面对的事实。说到西方文学的源头,人们会想到荷马。然而,荷马不是我们可以不设前提地放心追溯的文学始祖;事实上,西方文学史上或许没有哪一位重要作家比他的身世更加扑朔迷离。荷马不总是可以“实证”的,有西方学者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荷马其人。荷马真实,却也虚缈,但无论如何,讲授

西方文学史不能避开或绕过他,否则便会脱离本真,不是追根寻源。

一、荷 马

历史经常是不明晰的。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用不多的词汇概括过荷马的诗风,其中之一便是“简约”(simplicity)。然而,这位文风庄重、快捷和直朴的希腊史诗诗人却有着不明朗的身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团。首先是他的名字,Homeros 不是个普通的希腊人名。至少在希腊化时期以前,史料中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以此为名的人物。Homeros 被认为是 homera(中性复数形式)的同根词,可作“人质”(亦即“抵押”)解。然而,以诗唱换取客地居民招待以解决生计,是古代游吟诗人的常规做法,并非荷马一人为之,荷马显然不是古希腊最早的唱诗者。既如此,何故由他一人独得此名?此外,即使有人愿意用“浑名”相称,荷马也不会乐意接受,日后会予以改变。Homeros 亦可拆解作 home(h) oron,意为“看不见(事物)的人”,亦即“盲人”,这一解析同样显得牵强,许是根据《奥德赛》里的盲诗人德摩道科斯所作的反推,把荷马想当然地同比为古代唱诗者中不乏其人的瞽者。细读史诗,我们会发现荷马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对色彩和光亮的分辨尤为细腻。荷马的名字还被解作短诗的合成者。有学者试图从 Hom-eridai(荷马的儿子们,荷马的弟子们)倒推 homeros 的成因,所作的努力值得嘉许。然而,此类研究也可能走得过远。比如,历史上曾有某位英国学者,此君突发奇想,竟将 Homeros 倒读为 Soremo,而后者是 Soromon(所罗门)的另一种叫法,由此将荷马史诗归属到了一位希伯来国王的名下。应该指出的是,从字面推导含义是西方学者惯用的符合语文学(philology)旨趣的常规做法,即便尝试倒读人名,也算不得十分荒唐,只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不符乃至南辕北辙,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

荷马若隐若现,他的生活年代充满变数,让人难以准确定位。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依据民间传说,提供并满足于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的设想,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评估。从特洛伊战争时期(约公元前 13—前 11 世纪)到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从伊奥尼亚人的大迁徙到公元前 9 世纪中叶或特洛伊战争之后五百年,都被古人设想为荷马生活和从艺的年代。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认为,荷马的在世时间“距今不超过四百年”(《历史》2.53,比较2.142),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 850 年左右,而他的同行修昔底德(Thucydides)则倾向于前推荷马的创作时间,将其定位于特洛伊战争之后,“其间不会有太远的年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荷马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人氏?我们所能找到的“外部”文献资料似乎不能确切回答这个问题。另一个办法是从荷马史诗,亦即从“内部”寻找问题的答案。大量文本事实

表明,荷马不是生活在迈锡尼时期,因此不可能是战争的同时代人。从史诗中众多失真以及充斥着臆想和猜测的表述来看,荷马也不像是一位生活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追述者。由此可见,希罗多德的意见或许可资参考。但是,考古发现和对文本的细读表明,希罗多德的推测或许也有追求古旧之虞。《伊利亚特》(6.302—303)所描述的塑像坐姿,似乎暗示相关诗行的创编年代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8世纪;11.19以下关于阿伽门农盾牌的细述,似乎表明这是一种公元前7世纪以后的兵器;而13.131以下的讲述更给人“后期”的感觉,因为以大规模齐整编队(phalanx)持枪阵战的打法有可能盛行于公元前7世纪末以后。然而,靠前引起质疑,后推亦需谨慎。著名学者沃尔特·布尔克特(Walter Burkert)将《伊利亚特》的成诗年代推迟到公元前660年的做法^①,似乎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荷马史诗自有它的得之于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古朴,零星出现的后世资证和著名学者的靠后评论,都不能轻易改变这一点。综观“全局”,我们认为,把荷马史诗主体内容的成篇年代定设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或稍后比较适宜,其中《奥德赛》的成诗或许稍迟一些,可能在公元前8世纪末或前7世纪初。

荷马的出生地在哪?这个问题同样不好准确回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均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公元前8至前7世纪也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作为信史引证的第一手资料。据说为了确知荷马的出生地和父母是谁,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还专门咨询过德尔菲的神谕。^②在古代,至少有七个城镇竞相宣称是荷马的出生地,并且似乎都有各自的理由。它们是斯慕耳纳(现名伊兹米尔)、罗德斯、科罗丰、萨拉弥斯、基俄斯、阿耳戈斯和雅典。能够成为荷马的乡亲,自然是莫大的荣誉,尤其是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他名望鼎盛,如日中天。但是,荷马的出生地毕竟不可能多达七处,否则我们将很难把他当作一介凡人。希腊文化的传统倾向于把荷马的故乡划定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伊奥尼亚希腊人的移民区。任何传统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荷马对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所知甚少,表明他不是从小在那片地域土生土长的。此外,《伊利亚特》中的某些行段(9.4—5,11.305—308)暗示他的构诗位置可能“面向”希腊大陆(或本土),即以小亚细亚沿海为基点。荷马所用的明显带有埃奥利亚方言色彩的伊奥尼亚希腊语,也从一个侧面佐证着他的出生地不在希腊本土或罗德斯等地。再者,作为一个生长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荷马或许会比生活在希腊本土的同胞们更多一些“国际主义”精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叙事的中立态度以及不时流露出来的对敌人(特洛伊人)的同情心里看出

① M. Mueller, *The Ilia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p. 1. 不排除史诗中的极少量内容可能得之于公元前660年以后修缮增补的可能。

② D. B. Levine, “Poetic Justice: Homer’s Death in the Biographical Tradition”, *The Classical Journal* 98. 2 (2002/03), p. 141.

来。上述原因会有助于人们把搜寻的目光聚焦到小亚细亚沿海的斯慕耳纳和基俄斯,与传说中的主流见解相吻合。开俄斯的西蒙尼德斯(Simonides)设想基俄斯是荷马的出生地(他称荷马是一个“基俄斯人”(Chios aner));事实上,那儿也被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是“荷马的弟子们”发迹并长期诵诗从业的地方。在古代,荷马被认为是史诗作者(或诗人)的代名词,所有以特洛伊战争、战后英雄们的回归及相关经历为背景的系列史诗(the epic cycle,如《库普里亚》、《埃塞俄庇斯》、《小伊利亚特》和《回归》等)以及众多的颂神诗(如《阿波罗颂》、《狄俄尼索斯颂》和《赫耳墨斯颂》等),都被认为出自荷马的凭借神助的天分。基俄斯诗人库奈索斯(Kunaihos)创作了《阿波罗颂》^①,却并不热衷于拥享作品的署名权。不仅如此,他似乎还有意充分利用人们对荷马的感情和“印象”,宣称该诗的作者是一位“来自山石磷峒的基俄斯的盲(诗)人”(tuphlos aner,《阿波罗颂》172)。库奈索斯的做法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不仅是基俄斯人,而且还是当地“荷马弟子们”的首领,率先(公元前504年或更早)向远方输出荷马的作品,在叙拉古吟诵“老祖宗”的史诗。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相信荷马的家乡在基俄斯,但史学家欧伽昂(Eugaion)和学者斯忒新勃罗托斯(Stesimbrotos)则沿用了公元前5世纪同样流行的荷马为斯慕耳纳人的传闻。抒情诗人品达(Pindaros)的“视野”似乎更显开阔,既认为荷马是斯慕耳纳人,也愿意折中,接受荷马同时拥有基俄斯和斯慕耳纳双重“国籍”的提法。有人认为荷马出生在斯慕耳纳,但在基俄斯完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相传荷马卒于小岛伊俄斯^②,该地每年一次,在一个以荷马名字命名的月份,即Homeron里用一只山羊奠祭诗人的亡灵。

二、荷马史诗的古代境遇

希腊神话并不发轫于荷马。荷马既非它的首创,也不垄断故事的编制。在史诗的草创时期,人们对诗歌内容的重视显然甚于对它的作者。荷马的得之于传统的“历史”真实性在公元前7世纪没有受到怀疑。尽管如此,荷马的名字在成文的作品中非常罕见,这或许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们的疑虑,也可能与存世作品的稀少不无关系。公元前6世纪初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质的改变,荷马名字的出现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仿佛人们突然意识到他的重要,觉得既然可以随意复诵或引诵他的诗行,就不必忌讳提及他的名字,不必再对荷马的历史真实性存怀戒心。当然,我们亦不宜低估“荷马弟子们”的活动,他们的从业稳步扩大着荷马的影响,最

① 修昔底德认为此篇乃荷马所作并称其中的有关文字是荷马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104。

② Ios,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接受了这一提法。

终汇同其他因素,使荷马的名字进入千家万户,成功塑造了一位“诗祖”的形象。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荷马是否确有其人已经不是问题。人们热衷于关注的是他的功绩,此外便是他的过错。人们开始评论荷马。有趣的是,这一时期得以传世至今的对荷马及其诗歌的评论,不是热切的赞颂,而是无情的批评。科洛丰诗人哲学家塞诺法奈斯(Xenophanes)抨击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神学观,指责他们所塑造的神明是不真实、有害和不道德的(片断11、14、15)。大约三四十年之后,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以更严厉的措词狠批荷马,认为他应该接受鞭挞,被逐出赛诗的场所(片断42)。据传毕达戈拉斯(Pythagoras)曾在地府里目睹过荷马遭受酷刑的情景。故事的编制者显然意在告诉世人,荷马为自己对神祇的不体面描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类传闻荒诞不经,自然不可信靠,这里略作提及,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后世某些哲人对荷马以及由他所代表的诗歌文化的憎恨程度。公元前6世纪,新兴的逻各斯(logos)和由它所标志性地昭示的逻各斯(即理性)精神,已经在希腊学界和酷爱谈论的希腊人的智性生活中崭露头角。哲人们显然已不满于荷马史诗对世界和神人关系的解释,迫切想用能够反映科学精神的新观点,取代荷马的在他们看来已明显趋于陈旧的神学观。在逻各斯耀眼的理性光芒的映衬下,老资格的秘索思(mythos,“诗歌”、“神话”、“故事”)相形见绌,逐步退居守势。

然而,希腊文学和文化需要一面旗帜。据被归于柏拉图名下的《希帕耳科斯篇》228B的记载,雅典执政裴西斯忒拉托斯(Peisisstratos)之子希帕耳科斯(Hiparchos)是把荷马史诗引入雅典的第一人。无论此说是否可信,荷马史诗进入雅典似乎必定与裴氏父子的活动有关。公元前535年前后,裴西斯特拉托斯组织了一个以俄诺马克里托斯(Onomacritos)为首的诗人委员会,负责收集各种诗段并以传统成诗(或文本)为参考,基本定型了荷马史诗的受诵样本。公元前520年左右,裴西斯特拉托斯(或其子希帕耳科斯)下令,将吟诵荷马史诗定为泛雅典娜庆祭节上的保留项目,由参赛的诗人们依次接续(ex hupoēpseōs,即后继的吟诵者从前一位的停顿处续接),当众吟诵。裴西斯特拉托斯的努力,对规范吟游诗人们的诵诗和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少数哲人批贬荷马的同时,诗人们却继续着传统的做法,就整体而言保持并增进着对荷马的信赖和崇仰。西蒙尼德斯赞慕荷马的成就,认为是荷马的精彩描述才使古代英雄们的业绩得到了彪炳后世的传扬。在说到英雄墨勒阿格罗斯(Meleagros)在一次投枪比赛中获胜的事例时^①,他提到了荷马的名字,用以增强叙事的权威性。荷马和斯忒西科罗斯(Stesichoros)便是这样对人唱诵的(参阅《对句格诗》11.15—18,19.1—2,20.13—15)。埃斯库罗斯(Aeschylus)谦称自己的悲剧为“荷马盛宴中的小菜”(阿塞那伊俄斯<Athenaios>),

① 此事不见于今本荷马史诗。

《学问之餐》8.347E)。我们了解埃斯库罗斯对悲剧艺术的卓越贡献,认可他的作品所取得的高度的艺术成就。他之所以这么说,固然是考虑到荷马史诗的规模和数量(在当时,荷马被普遍认为不仅仅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但同时也可能是出于他对荷马的敬重。他不认为自己的成就可以与荷马相提并论,故而在用词上体现了罕见的谦逊。当然,从埃斯库罗斯的形象比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纳入荷马的“系统”(柏拉图称荷马为第一位悲剧诗人),以能够成为荷马传统的一部分而感到光荣。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感情还是气质和行文的风格来评判,埃斯库罗斯都秉承了荷马的遗风,是极具荷马风范的悲剧诗人。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同样崇拜荷马。他赞赏荷马的博学,不怀疑他在希腊民族中所处的当之无愧的教师地位,誉之为“神圣的荷马”(theios Homeros,《蛙》1034)。抒情诗人品达摘引荷马,赞同当时流行的荷马是史诗《库普里亚》作者的观点(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希罗多德是把《库普里亚》删出荷马作品的第一人,《历史》2.117),并称荷马把这部史诗作为陪嫁,将女儿嫁给了库普里亚(即塞浦路斯)人斯塔西诺斯(Stasinos)。品达对荷马并非没有微词。但是,他的批评是含蓄而合乎情理的,有别于同样多次提及荷马的赫拉克利特对他的恶毒攻击。品达认为,荷马拔高了古代英雄们的形象,以他典雅和瑰美的诗句使奥德修斯受到了过多的赞扬(《奈弥亚颂》7.20—21)。^①阿里斯托芬根据需要变动引用过荷马的诗行;荷马的用语在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或他的弟子们)的著述中亦有见例。荷马史诗是知识的库藏。公元前5世纪以降,它(或史诗的节选本)是雅典的孩子们必读的教材。

荷马史诗的所指经历了由宽泛到相对具体的嬗变。希罗多德引用荷马史诗计11个行次。此外,作为书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最早见诸于他的著述(《历史》5.67)。修昔底德引《伊利亚特》仅一个行次,但引《阿波罗颂》的诗句却高达13例。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是把《阿波罗颂》当作荷马史诗加以引用的。这表明他像许多前辈文人一样,将包括《阿波罗颂》在内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荷马诗颂》的众多颂神诗全都看作是荷马的作品。这种情况在公元前4世纪发生了改变。亚里士多德似乎已不认为《阿波罗颂》是荷马的诗作,尽管他仍然把《马耳吉忒斯》归入荷马的名下。当柏拉图和塞诺芬(Xenophon)提及荷马史诗时,他们的指对一般均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引诗行似乎也都出自这两部史诗。从现存的古文献来看,雷吉昂学者塞阿格奈斯(Theagenes,活动年代在公元前525年前后)是希腊历史上著述研究荷马史诗的第一人,所著《论荷马》以讨论荷马史诗的喻指功能(al-

^① 品达三次提到荷马的名字。品达的提及客观上起到了互相“增光”的作用,使两位大诗人(即荷马和他本人)相得益彰(Cf.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edited by I. Morris and B. Powell,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1997, p. 39)。

legoria)为主,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即已失传。他提出的荷马史诗里的神祇皆可喻指自然界里的物质或现象的观点,对后世学者的影响甚深。斯忒新勃罗托斯(据说他能揭示作品中藏而不露的意思<tas huponoias>)、格劳孔(Glaucon)和阿那克萨戈拉斯等人都曾沿袭他的思路,著述或研讨过当时(即公元前5世纪)的学者们所关注的某些问题。柏拉图对荷马史诗颇有研究,但囿于自己的学观取向,他的评论往往多少带有偏见,无助于人们正确和客观公正地解读荷马。亚里士多德写过《论诗人》、《论修辞》、《论音乐》、《诗论》等著作,其中应该包括研析荷马史诗的内容。《荷马问题》是一部探讨荷马史诗里的“问题”和如何解析这些问题的专著,可惜也像他的上述文论一样早已失传。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他的论诗专著中硕果仅存的一部(当然,他的《修辞学》也间接谈到诗论问题)。在《诗学》里,针对评论家们(比如安菲波利斯的佐伊洛斯<Zoilos>)就荷马的用词和立意等方面的不一致所提出的有些是吹毛求疵的批评,亚里士多德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辩驳,不少观点见地精当,但有时也难免矫枉过正,流露出不够客观的替尊者讳的倾向,仿佛荷马是不会、也不应该出错的。《诗学》高度评价了荷马史诗的艺术成就,赞扬荷马“不知是得力于技巧还是凭借天赋”,几乎在所有有关构诗的问题上都有高人一筹的真知灼见(8.1451a22—24)。罗马文论家贺拉斯(Horatius)很可能没有直接读过《诗学》,但有理由相信他会从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塞俄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os)和其他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成员(如萨图罗斯<Thauros>和尼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os>等)的著述中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包括对荷马以及他的史诗的评价。包括西塞罗(Cicero)在内的罗马文人,大概也会通过上述途径接触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诗艺观,从而强化自己的理论素养,加深儿提时代即已通过家庭或学校教育获取的对荷马的美好印象。毕竟,对于罗马文人,掌握希腊语的另一种说法是“已经熟读荷马”。在意大利,荷马的影响是巨大的。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罗马人已经可以读到安德罗尼科斯(Andronicus)翻译的《奥德赛》。罗马文学之父埃尼乌斯(Ennius)极度崇拜荷马的诗才,声称自己是荷马的“转世”。

荷马不仅是诗人,也被看作是学问家。校勘荷马史诗必须建立在渊博、丰广的知识基础之上,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极能体现学力的表现形式。公元前4世纪末,托勒密家族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利用雄厚的财富积累大力推动并弘扬科学文化事业,鼓励学人重视对古希腊重要文献文本的搜集和整理,在亚历山大创建了规模宏大的图书馆。至菲拉德尔福斯(Philadelphos)统治时期(公元前285—前247年),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抄本已达40万卷(相当于当今八开本的图书4万册)。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是菲勒塔斯(Philetas)的学生、厄菲索斯的泽诺多托斯(Zenodotos,约出生在公元前325年)。他校勘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首次将这两部史诗分别节分为24卷。在此之前,学者们习惯于以内容定名或称呼其中的部分,所指不甚准确,也

难以形成规范。泽诺多托斯著有《荷马词解》(*Glossai*)。像他的校勘一样,此举虽然功不可没,但明显带有严重的个人主观取向,对词义的解析常显不够精细,有时趋于武断。继厄拉托塞奈斯(Eratosthenes)之后,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公元前257—前180年)接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职务,承上启下,继续着由泽诺多托斯在那个时代参与开创的以诠释词义为中心的研究工作。阿里斯托芬是个博学的人,精通文学、修辞、语言学、语文学,擅长文本的考证研究,首创重音符和音长标记,在泽诺多托斯和雷诺斯(Rhianos)校本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改进和完善了校勘的质量。对荷马史诗的细致辨考和注疏,促成了西方校勘学的诞生。

一种学术,在它的潜力没有被充分发掘之前,通常不会止步。荷马史诗的勘证工作有了厚实的资料积累,但仍需有人在既有的基础之上全面推进,辨识真伪,疏解疑难,形成治学的系统。当时的亚历山大不缺知识渊博的学者,但真正具备严格的学术意识并且能够代表亚历山大学者治学(指荷马史诗研究)水平的,是阿里斯托芬的学生、来自爱琴海北部岛屿萨摩斯拉凯的阿里斯塔耳科斯(Aristarchos, 约公元前217—前145年)。阿波罗尼俄斯卸任后,阿里斯塔耳科斯接受了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的荣誉,也挑起了这一重要职位所赋予的责任。他以更加严肃的态度治学,两次校订荷马史诗(换言之,完成了两套校订本),并在页边写下了大量的评语(hupomnema),其中的许多行句经后世经典注疏(scholia)学家引用而得以传世,受到近当代荷马史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作为当时的顶尖学者(ho grammatikotatos〈阿塞那伊俄斯《学问之餐》15.671〉),阿里斯塔耳科斯一生写过八百余篇短文,大都与荷马及其史诗(或相关论题)的研究有关。与有时或许会夸大史诗的哲理释义,倾向于过度开发喻指的潜力以资证斯多葛学派观点的裴耳伽蒙(Pergamum)学者克拉忒斯(Crates)不同,^①阿里斯塔耳科斯提倡例证的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类推(analogy)的研究方法,重视文本内部提供的信息资料,避免无依据的立论,不作缺乏语法和可靠语义支持的哲学或哲理引申。阿里斯塔耳科斯创立了自己的学派,他的直接影响一直延续至罗马的帝国时代,学生中不乏后世成为著名学人的佼佼者,包括修辞学家阿波罗多罗斯和语法学家狄俄尼西俄斯·斯拉克斯(Dionysios Thrax,或色雷斯的狄俄尼西俄斯)。尽管如此,阿里斯塔耳科斯

① 克拉忒斯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荷马学者(Homerikos),一位在语法和修辞方面有造诣的批评家(kritikos)。Cf. J. I. Porter, "Hermeneutic Lines and Circles: Aristarchus and Crates on the Exegesis of Homer", in *Homer's Ancient Readers*, edited by R. Lamberton and J. J. Keane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686. 最新研究表明,此君不一定完全赞同斯多葛学派的主张。对科学和天体的重视,使他拥有了研析荷马史诗的不同于阿里斯塔耳科斯的视角。阿里斯塔耳科斯提倡“以荷马解析荷马”(即从荷马史诗内部寻找解析史诗里的疑难字句)的研究方法(L. D. Reynolds and N. G.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3)。

及其前辈们的工作都难免带有时代赋予的局限性。他们似乎过多地折服于荷马的诗才和传统形成的权威，遇到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往“好”的方面去设想。所以，尽管阿里斯塔耳科斯的研究方法经常是“分析”的，他的治学立场却是“统一”的，亦即立足于维护荷马的威望以及他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可分割的“统一”（或单一）作者的传统观点。尽管如此，公元前3至前2世纪的荷马史诗研究成果斐然。亚历山大学者们的研讨涉及面广，切入点多元，所作评注涵盖语言、格律、神话、历史和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与此同时，与亚历山大学者比肩而立的裴耳伽蒙学者（如塞普西斯的德米特里〈Demetrius〉和伊利昂的波勒蒙〈Ploemon〉等）则更多地采取历史研究和考古的角度，其成果同样引人注目，对亚历山大学者的的工作形成了极有价值的补充。^① 当时的荷马学界还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公元前3世纪，学者克塞农（Xenon）和赫拉尼科斯（Hellanikos）先后对《奥德赛》的作者归属提出异议，认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它与《伊利亚特》都很不相同，因此不可能由创编《伊利亚特》的诗人所作。一般认为，克塞农和赫拉尼科斯是最早的倚重于“分析”的分辨派学者（chorizontes），他们的态度和观点或许在阿里斯塔耳科斯等正统派学者看来不很严肃，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毕竟，他们率先就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铁定作者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提出了分辨的设想，使人们看到了解析荷马史诗的另一种可能。

三、“统一”与分辨之争

公元3世纪下半叶，普罗提诺（Plotinus）创立了一个研究柏拉图哲学的新学派。新柏拉图主义者热衷于发掘荷马史诗的喻指潜力，在研究中揉入了心灵的感受。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耳夫利（Porphyry）深化了新毕达戈拉斯主义者努墨尼乌斯（Numenius）的“洞见”，以柏拉图在《国家篇》第七卷里所表述的“洞穴说”为参照，对《奥德赛》13.96—112所描述的“仙女的洞穴”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波耳夫利看来，《奥德赛》深刻揭示了心灵由沉沦向“真实的家园”回返的艰难历程。柏拉图与荷马殊途同归。对于那个时代的学者，深挖荷马史诗的喻意，是研究的主要样式。波耳夫利痛恨基督教，但全力捍卫基督教义的人士，如查士丁（Justin）、克莱门（Clement）和奥里根（Origen）等，也同样心仪于希腊神话的喻指潜力，认定荷马史诗先行昭示了基督教的真理。随着中世纪的到来，曾是一门显学的荷马史诗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教廷反对荷马史诗所宣扬的多神论，压制乃至禁止“异教”思想的传播。在漫长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西方世界没有产生过成

^① C. A. Trypanis, *The Homeric Epic*, Warminster: Aris and Phillips, 1977, p. 105.

就可与阿里斯塔耳科斯等人比肩的学者,匿名学人的评论经常流于转述,缺少真知灼见。不过,荷马的影响没有绝迹。在知识界,多神论迟至 5—6 世纪仍然延续不灭,至少在亚历山大和雅典的柏拉图学校里仍有小范围的研讨,多神论者仍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看作是有能力从虚构故事的背后发现真理的高水平研究者们深研的读本。得益于《拉丁伊利亚特》(*Ilias Latina*, 计 1070 行)一类作品在民间的传播,西方人了解有关特洛伊战争传闻的途径没有彻底断绝。《拉丁伊利亚特》有可能是中世纪一些学校采用的教材。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a)酷爱古典文学,直到去世之前仍在用心注释拉丁文版的《奥德赛》。^① 荷马史诗最早的印刷本于 1488 年在意大利问世,此后便新译迭出,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及至莎士比亚写作戏剧的时代,伦敦的绅士们已能读到查普曼(G. Chapman)英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人们对荷马及其史诗的了解程度有了较大的改观。莎翁写过一出取材于特洛伊战争传闻的悲喜剧《特洛伊洛斯与克瑞西达》,颇得好评,可见当时的伦敦观众已或多或少地具备了接受此类剧作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情趣。

荷马史诗研究再度成为显学。17 世纪 90 年代,发生在英、法两国的“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起到了某种激励的作用,汇同其他因素,把欧洲学人的目光引向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内容孰“新”孰“旧”问题的关注,由此启动了新一轮的以荷马史诗为对象的历史批评。热奈·拉宾(René Rapin)和威廉·坦布尔(William Temple)坦言他们更愿意信靠裴西斯忒拉托斯执政时期定型的荷马史诗抄本。1684 年,学者佩里卓尼俄斯(Perizonios)提请人们重视书写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1713 年,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发现并指出了辅音 F(作 w 音读)在荷马史诗里已经消失的“隐性”存在,提出荷马创编的很可能是一批内容上可以独立成篇的短诗(他们大概均以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数百年后才由后世歌手或吟游诗人组合成长篇史诗的观点。《新科学》的作者、那不勒斯的维柯(Gimmbattista Vico)语出惊人,认为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荷马其人,“荷马”只是个代表并统指古代歌手的集体名称。继托马斯·布兰克威尔(Thomas Blackwell)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之后,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于 1769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荷马的原创天才与写作——兼论特罗阿德的古貌与现状》的文章,认为荷马“既不能阅读,也不会书写”,并不比他的同时代人掌握更多艰深的天文学和宗教知识。^② 这一见解直接与经由勒波苏(Le Bossu)和安德瑞·达西尔(Andre Dacier)

① 1354 年,一位名叫西格罗斯(Sigeros)的人从君士坦丁堡给彼特拉克送去了一份荷马史诗手抄本(J. A. Scott, *Homer and His Influence*, Boston: Marshall Jones Company, 1925, p. 123)。彼特拉克一生致力于复兴古典学术,在相关领域做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R.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 3)。

② D. M. Foerster, *Homer in English Criticism*, Archon Books, 1969, p. 107.

等法国文论家深化的新古典主义学观形成了冲突,传递了一条明确的信息,亦即荷马史诗之所以在古代得以流传,靠的不是实际上不存在的精心构组的规范文本,而是建立在博闻强记基础之上的诗人的口诵。

在既不能脱离历史,又旨在使解析符合学术情理的不懈努力中,德国人后来居上。1795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发表了专著《荷马史诗导论》,大致奠定了近代荷马学的理论基础。除了罗伯特·伍德的上述相关见解,促使沃尔夫写作《荷马史诗导论》的另一个因素,是法国学者维洛伊森(Villoison)于1788年整理发表的*Venetus A*。此乃《伊利亚特》现存最早的全抄本,在当时是个轰动的事件。在沃尔夫看来,既然*Venetus A*的成文不早于公元1世纪(他误以为此抄本的母本是当时已受到质疑的阿里斯塔耳科斯的校勘本(尽管校勘本本身早已失传))却又能成为现有最早的抄本,因此它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很可能不是古代权威抄本的真传。他由此推断荷马史诗肯定以口诵的方式长期存在于成文抄本的出现之前,口头唱诵是荷马史诗流传的本源。伍德没有提及而沃尔夫则依据上述认识引申得出的另一个观点是,考虑到人的记忆力的有限,诗人不太可能完整地把长篇史诗默记在心。因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必定只能由可供单篇唱诵的叙事诗歌的串联和组合而成,而这些短诗所涉内容有所差异,故事的风格也不尽相同。

沃尔夫的影响深远,不可低估。在整个19世纪,分析派(也被叫做分辨派或区分派)的学说在西方荷马研究领域强势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沃尔夫的《荷马史诗导论》以及众多响应者的著述面前,统一派的见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个别统一派学者的抗争顶不住基于文本事实的批驳,其论述有时显得捉襟见肘,而他们维护荷马“一统”权威的良好意愿也常常显得过于感情用事,经不起学术规则的检验。直到19世纪末以前,西方学界既没有推出一部高质量的维护统一派立场的专著,也没有出现过一篇学术含量高得足以与分析派观点相抗衡的论文。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学者逐渐加入到分析派的行列中来。尽管如此,总的说来,分析派是一个德国现象,持分析(即分辨)立场的顶尖学者集中在德国的一些高校里,从事著书立说和传授弟子的工作,成果颇丰。

分析派从来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存在争议的铁板一块。从这个阵营里很快分裂出两个派别,一派完全秉承沃尔夫的学说,强调荷马史诗的合成(*liedertheorie*),而不刻意区分合成成分的主次。这派学者以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为代表,主要成员包括赫尔德(Den Herder)和斯藤萨尔(Wilfred M. Steinthall)等。值得注意的是,拉赫曼开启了一种“比较”的视野。他从分析《尼伯龙根》和《卡莱瓦拉》的情节入手,找出其中互为独立的部分,然后推而广之,认为《伊利亚特》亦具备同样的可解析属性,由18个可以独立成诗的故事或短歌(*lays*)构合而成。另一派学者以高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为先锋人物。在1832年发表的